

网络写作：文学“常变”的道德与美学问题

周保欣

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并非空穴来风，如果放到文学大历史中看，它不过是文学史传播和书写工具变革的常态现象。因此，对网络文学的学理研究，亦应当从文学史的“常变”规律来看。网络文学的崛起，其文学史意义在于恢复文学被中断的民间起源，构造一种“文学社会”的底层结构，同时，也是对文学娱乐性原初叙事伦理的恢复。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网络的自由，但网络文学的悖论是：自由的道德在于创造，没有创造的自由是不道德的自由。网络文学的发展，必须解决好自由与创造的关系，创造出属于网络文学的经典。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伦理视野中的当代文学及其经验反思”（06CZW018）阶段性成果

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是近些年来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这不单纯是因为网络文学作品的数量众多、读者广泛以及文学网站林立，更重要的还在于，网络文学的兴起，已经对传统的文学秩序造成严重的冲击，改写着我们对文学的观念、存在样态与功能等的认识，并正以前所未有的普及力度和影响力，对读者和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尽管网络文学并非中国的特例，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学人口是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企及的，在这样的文学人口大国，网络文学的影响力绝对不可小觑。

和网络文学在中国大陆初兴时期人们的不冷不热态度相比，近些年来，网络文学已经受到相当的重视，人们不仅在学术层面对之展开深入的研究，国家文联和一些省文联还相继开展“网络文学创作大奖赛”，以期规范和有效引导网络文学创作。不少网络写手被“招安”，成为各级作协会员，“茅奖”、“鲁奖”等国内最高文学奖项，也开始吸纳网络文学作品参评，同时，相当多的网络文学作品从网络走向纸质媒介，在图书市场占据可观的份额，许多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动漫与网游。这些足可证明，网络文学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已经占据重要的位置。

在网络文学已是一片繁荣的气象下，如何正视它的异军突起，如何看待它给传统文学格局带来的深刻变化？网络文学有怎样的美学与伦理经验值得我们关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

的“分疆而治”是否必然走向文学的统合?如何看待网络文学草根性创作的道德自由以及这种自由的道德担当?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的。特别是当前,网络文学创作可谓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在学术层面清理网络文学某些被遮蔽和忽视的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民间起源与文学社会的“底层结构”重建

应当说,网络文学的横空出世并非什么奇怪的事情,而是深植在文学史的固有逻辑之中的,既有文学史的普遍性,又有其不可取代的特殊性。从文学史的基本经验观察,网络文学尽管带有电子和信息时代的高科技特点,但它不过是文学书写与传播工具变革所衍生的文学产物。这种文学书写、传播工具的改变导致文学新形态的产生,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相当普遍的。众所周知,自有文学至今,在书写与传播方式上,我们至少经历了口头传播、刀刻竹载、毛笔—纸帛、钢笔—纸张、电脑—网络这样几个阶段。文学书写与传播工具每个技术环节的变革,都给文学的内在秩序带来深刻的变化。在起源阶段,文学的口头创作与传播形式,必然要求文学朗朗上口、音节简单、押韵合辙,以便于记诵,这决定了早期文学以韵文为主。世界各民族的早期文学均以诗歌为主,与这种传播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入刀刻竹载时代,因为书写困难和文本物理体积的限制,文学的语言、文体、长度等构成文学书写客观的问题。试想,如果老子的《道德经》不是以深奥的古语写就,不是五千字箴言,而是以浅显的白话写成,或像现在许多哲学著作那样,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字,那么,老子终其一生,恐怕也“刻”不出这部经典。即便能够刻出,书写的成本,文本的保存、运输等,肯定都是不小的考验。书写工具与文学演变的关联,在文学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是非常普遍且具有连续性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文学书写工具与传播方式演化的历史。只不过迄今为止,我们的文学史叙述,更多是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整合文学演变的规律,对于文学工具变革给文学秩序带来的变化尚缺乏足够认知。

网络给文学带来的质态上的改变,学者们已有不少论述。欧阳友权对此作出过系统的研究,他从作家、文本、读者接受、创作方式、文学传播、文学观念、文学功能等层面,细致地分析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不同,认为与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作家身份的网民化”、“创作方式的交互化”、“文本载体的数字化”、“流通方式的网络化”、“欣赏方式的机读化”等方面^①。董学文也曾对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作出判断,认为“网络文学还是文学的一种,只是应用工具和传播渠道不同而已,说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有本质的区别,还为时过早”^②。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究竟处在何种关系结构中,究竟是文学的一种,还是别有新声的另类,文学史经验亦有很好说明。在文学的历史上,任何一次书写和传播工具的变革,实质上都是具有历史“拐点”意义的,它不仅影响到文学的物质存在形态,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文学的审美质态和某个特定时段文学的整体风貌。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诗书画合一”的美学趣味,与毛笔的使用并非没有关联,曹雪芹写《红楼梦》,自感“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恐怕也不单是创作态度和对自我身世的悲苦自怜的问题,还有毛笔文学时代书写的艰难。而电脑作为文本输入工具,不仅直接构造出网络文学,同时对传统文学亦有影响。以长篇小说论,1949年建国初至20世纪80年代,我国长篇小说产量一直维持在每年几十部到百部之间,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电脑的普及,长篇小说产量也扶摇直上,每年达到一千部左右,最近几年,随着网络文学大军加入图书出版市场,长篇小说的总体数量陡然上涨到三千至五千部之间^③。这种量的变化,如果没有电脑带来的书写、修改的便利,是不可能发生的。从作家个

体的角度看,现在许多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总量都达到二十部以上,不少作家半年甚至几个月就能完成一部长篇小说,这样的创作速度同样得益于电脑的便利,是毛笔和钢笔文学时代难以想象的。但是,无论电脑与网络给文学带来多大的变化,都是在文学史的内在统一性之中的发生的。我们所谓的“传统文学”,只不过是文学史自身不断的发生、变化、整合的结果。因此,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对峙,将不是“分疆而治”,而是正处在一个运动过程和新的传统文学生成过程中。近年来,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作品,网络作家的作品回归纸质文本,这些现象都是屡见不鲜的。网络文学必然给传统文学带来压迫,并促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传统文学的强大规范与文化伦理也势必对网络文学产生巨大的吸附和同化作用,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网络文学将给新的文学格局带来怎样的改变,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不过,它所造成的更古老的文学传统复辟倒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文学重现了它的民间起源。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情况看,一个基本的逻辑线索是知识分子的士文学与底层平民的民间文学的共存与互渗。《诗经》阶段“风”与“雅”的并存,就是这种文学景观的说明。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流程中,民间文学呈现出巨大的创造性和审美激情,词、小说、曲等文体,诗歌中的五言、七言、乐府等,都是经由民间首创,后经过文人的经典化从而进入文学史的;小说、戏曲中的题材与内容,又多由民间故事演化而来。对于这种民间起源,胡适曾有专论:“人的感情在各种压迫之下,就不免表现出各种劳苦与哀怨的感情,像匹夫匹妇,旷男怨女的种种抑郁之情,表现出来,或为诗歌,或为散文,由此起点,就引起后来的种种传说故事,如‘三百篇’大都民间匹夫匹妇,旷男怨女的哀怨之声,也就是民间半宗教半记事的哀怨之歌。”^④胡适还把民间为主导的白话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老实说罢,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要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了。”^⑤这种判断,与胡适作为“五四”白话文学的倡导者身份是有关的,尽管有可能抬高了民间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但中国文学的民间起源与民间文学的巨大创造性是不容置疑的。中国文学“风”与“雅”、“士”与“民”共存的格局,可能与中国传统社会作家没有从“士”为代表的知识阶层中独立出来有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作家身份的含混与潜隐,民间才作为有效的丰富和补充进入文学的创造,与士文学共同铸造出中国文学的辉煌。在传统的文学格局中,士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交往与对流,主要是通过流落民间的知识分子完成的。

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以及现代报刊、出版和稿酬制度的形成,作家作为一种职业,才渐渐从文人集团分离出来。这既为文学的职业化和专门化提供了可能,又对传统文学“士”与“民”的二元格局起到无形的消解作用。自此以后,“士”与“民”的文学鸿沟就逐渐形成,士文学构成文学的支柱,并日渐精英化、经典化,而“民”的文学则渐趋没落。“五四”以来,“民间化”、“大众化”、“口语运动”、“民族形式”、“文章下乡”、“深入生活”等等,一部现当代文学史,可谓充满着民间的焦灼。这种焦灼,当然是启蒙和革命宣传的需求使然,但另一方面可否认为,当现代文学背离了文学原始的出身,当文学古老的起源被有意无意地忘却,我们的现代文学,必然会产生对那个古老起源沉重的罪愆心理与某种挥之不去的愧疚不安?不管怎么说,现在所谓的“传统文学”,从作家身份形成的角度来看,迄今只不过百年,而它的身后,则是数千年的“士”与“民”文学共存的伟大传统。饶有意味的是,虽然现代以来作家们费尽周折,甚至不乏政治力量的不断助援,试图推动文学的民间化,但最终总是无功而返。倒是在网络时代,当我们的作家“躲进小楼成一统”、逐步隔绝于社会的时候,网络却凭借着自身的力量与魅力,恢复了文学民间起源的重要传统。

网络文学作为理论家们所说的“新民间文学”，与文学史上的民间起源有着怎样的内在统一性？当下网络文学的新民间精神有何特点，是如何体现的？这种文学最终会如何改写现有文学史的格局？我们暂时无法做展开探讨，因为这本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涉及网络文学、文学史、文学理论的方方面面，须作沉实的学理研究，实非三言两语可以讲清，况且，网络文学的新民间质态还在孕育中，现在还不可妄下结论。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学的新民间精神主要体现在“我手写我心”的语言向度、民间本位的大众化立场、“粗口秀”的叙事方式、抵制崇高的写作姿态等方面^⑥。如此归纳虽有精到之处，然实难概括新民间文学的全部精髓。但无论如何，网络文学对文学民间起源的恢复，是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的。这不仅体现在文学的民间起源经过短暂“休克”后，重新回到文学的生命运动，更重要的是，通过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互动，必然会催生一种新的文学传统，构造出一种新的文学社会。这个新的文学社会正是文学获得生命活力的重要保证。因为，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我们所形成的新文学传统，其实构建出的只是文学的上层结构。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以一套精英的话语、意识形态建构起一种精英化的文学。这种文学面对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对底层民众多持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因此必然是小众文学。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失去政治的助力以后，纯文学渐渐边缘化，失去了它的轰动效应，这就是很好的证明。而网络文学的崛起，则以其草根性的特点，以多元、包容、开敞的存在样态，为我们构建起文学的底层结构，在恢复了中国古典文学深厚的底层社会传统的同时，还把广泛的文学人口拉回到当下文学中来，并且与传统文学一道塑造出一个立体的文学社会。这不能说不是网络文学的文学史贡献。

二、娱乐性：一种文学叙事伦理的正名

上述仅是网络文学给文学史带来新变的一端。另外一点，就不能不提到由它的崛起而引发的对文学伦理的反思。所谓“文学伦理”，简单地说就是文学作为一种叙事存在，自身应有的担当以及对这种担当的实现程度。这种文学伦理是文学存在的合理性根据，也是与其功能密切挂钩的。文学伦理是个动态的、系统的、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地域、民族、社会与文化环境下，人们对文学有不同的伦理诉求。就中国文学而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文以载道”等等，是我们最常见的对文学伦理或者说文学功能的表述。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里，周作人曾以“言志派”与“载道派”的双重变奏，来把握文学史演变的内在节奏。但是，“言志”也好，“载道”也罢，都不是文学的原始伦理，或者说不是文学伦理的全部。文学的原始伦理，是寄生在文学的起源中的，文学从哪里来，决定着文学是什么、有什么用。

当然，文学的起源是个学术难题。我们现在对文学起源的推断，如宗教祭祀说、劳动起源说、游戏起源说等，都缺乏较为确实的考古学支持。但逻辑上可以推断的结论是：诸如“言志”、“载道”等的文学伦理表述，毕竟是经过文学文化规训的一种次生性的文学伦理，而非文学的原初伦理。相比较而言，游戏的天性、倾诉的欲望、宣泄的焦灼、叙说的激情等，恐怕比“言志”、“载道”更具存在的合法性。我们不妨设想：如果孔子“删诗”之说成立，那么，被孔子“十去其九”的诗歌原貌是什么样子？那些作为文学事实而存在的诗歌本然的伦理关怀又是什么？这些虽说都是无法考证的，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那些诗歌不符合孔子“思无邪”的文学规范伦理，就忽视它们的存在。按照周作人的说法：“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里面，没有多大鼓动的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而“欲使文学有用也可以，但那已是变相的文学了。椅子原是为座位用

的,墨盒原是写字用的,然而,以前的议员们岂不是曾在打架时作为武器用过么?在打架的时候,椅子墨盒可以打人,然而打人却终非椅子和墨盒的真正用处。文学亦然”^⑦。周作人的判断是有道理的。文学的伦理本身就是一个生成的过程。现代性的文学伦理,只不过是现代社会生成的文学伦理,它不是法定的文学伦理。在《沉重的肉身》里,刘小枫提出“自由的叙事伦理学”概念,认为自由的叙事伦理学首先是一种“陪伴的伦理”,“也许我不能释解你的苦楚,不能消除你的不安,无法抱慰你的心碎,但我愿陪伴你,给你讲述一个现代童话或者我自己的伤心事,你的心就会好受得多了”^⑧。

刘小枫的“陪伴的伦理”,也仅仅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学伦理。在文学伦理演化上,道德主义文学伦理(儒家“诗教”传统)、历史主义文学伦理(“史传”文学、追求对历史的审美表现)、人道主义文学伦理(注重对人的灵魂、心理的揭示,对人的人性、精神加以合目的的改造)、修辞—技术主义文学伦理(追求文学的修辞、叙事、语言的技术含量)是四种重要的基本表现形态,并构成我们评述文学作品的经典意识。符合这四种文学伦理的,才有构成文学经典的可能,而背离这些伦理的,则必然被打入冷宫。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作家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就典型地体现了历史主义文学伦理与消费性的娱乐、消遣文学伦理之争。进入现代社会以来,随着宗教的式微,更是激发起文学担当人类的精神救主和拯救者的豪情,文学的历史主义伦理和人文主义伦理同时被推向神圣的地步,文学的消遣、娱乐、游戏、宣泄等以生理为基础的叙事伦理,因此被打压到黑暗的深渊,难以抬头。

正是如此,我认为网络文学在复兴了文学的民间起源的同时,还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诸多非经典文学伦理。消遣、娱乐、游戏、宣泄,乃至传统文学的自我抒发、感怀、历史讽喻等等,在当下的网络文学皆可觅其踪迹。像以《悟空传》、《沙僧日记》为代表的“戏仿小说”,以《鬼吹灯》、《盗墓笔记》为代表的“盗墓小说”,以《英雄志》、《昆仑》、《韦帅望的江湖》为代表的“武侠小说”,以《盘龙》、《长生界》、《恶魔法则》、《星辰变》为代表的“玄幻修真小说”等,其消遣性、娱乐性和游戏性都是不言自明的。有些网络文学作品,尽管从主题方面来看或许不乏严肃的成分,但在语言、修辞、构思、结构与人物形象设计上,同样难以拒绝消遣、娱乐、游戏的诱惑。比如《此间的少年》,虽被贴上“青春校园文学”的标签,所叙述的确是大学校园生活,但在作品的形式构成元素上,却采取网络流行的穿越小说的拼贴、嫁接等形式,把当代大学校园生活搬到宋代,虚构出“汴京大学”作为故事发生的空间背景;在人物塑造上,又以戏仿的形式,把金庸武侠小说的人物纳入,莫大、郭靖、黄蓉、杨过、穆念慈、乔峰、独孤求败等,都成为作家叙述当下大学校园青春生活的“空壳式”人物。这种嫁接形式在其他作品中同样有所表现,如颇具“官场小说”气质的网络作品《脸谱》和具有历史解构与还原意味的小说《明朝那些事儿》,人物、语言和情节上的戏谑成份也都非常明显。《脸谱》开头描述朱自强的父亲朱大长:“猪大肠本名朱大长,是个屠户,性如烈火,嗜酒如命,一米六五的身高,体重二百二十四斤,穿一身油腻腻的咔叽布衣服,无论往哪儿一坐,准得留下半米方圆的油印子。”夸张、幽默中略显刻薄。《明朝那些事儿》开篇交待朱元璋的出身,除了煞有介事地以档案的格式写姓名、别名、性别、民族、血型、学历、职业、家庭出身、生卒年月之外,还写出他最喜欢的颜色、社会关系和父母的职业,及其座右铭“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都是搞笑的幽默笔法。

娱乐性、消遣性、游戏性对网络文学来说是重要的生命线,因为它毕竟是靠点击率生存的,没有点击率,再好的作品也难以在网络这个残酷的世界获得立足之地。故此,我们不应该对网络文学的娱乐性、消遣性、游戏性、趣味性叙事元素抱以过多的指责。如前所说,娱乐性、消遣性、游戏性本身就是文学的一种伦理构成,它是作为严肃文学的补充而存在的,我们既不

能按照传统文学的叙事伦理要求它,进而取消网络文学的叙事伦理存在,也不能总是想用传统文学的镜子,来照出网络文学的本相。那些“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究竟是载体的区别,还是本质上的区别”、“网络文学是消遣文学,还是大众文学”的追问,事实上更多是出自批评者们的“概念的焦虑”,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载体的区别,必然会形成本质的差异,大众文学需要消遣,精英文学未必就非得是一脸的古板。况且,对于相当多的网络作品来说,无厘头、搞笑、错乱的时空、人物拼贴等等,只不过是一种叙事的策略和外在的包装,其内在的质地则可能是相当传统的。比如《新宋》、《窃明》、《梦回大清》、《步步惊心》等,叙事形式上的穿越,当然有作者谋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的意思,但作品通过当下与古代的历史对话和相互激活,往往感发出深具历史意味的复杂感受与生动的生命景象,并且在审美的质地上,兼具了一种穿透古今的历史超越感。这种审美质地的建立,是与我们所谓的“传统文学”有着相通的特质的。洪治纲在分析网络文学作品时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网络文学都呈现出这种信息化的特质。譬如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舍人的《宦海沉浮》、丝柳的《傻妻》、酒徒的《家园》,以及很多网络诗歌等,无论是其思维模式,还是审美趣味,都与我们的纸质作品没有太多的差别,所不同的只是它们首先发表在网络。”^⑨著名网络写手李寻欢也认为:“我觉得网上的东西和纸上的东西本质是一样的,所以没什么诀窍,好的东西会移植成功,不好的东西就不成功。网络从来没有改变文学本身任何东西,它只是一个新载体。”^⑩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感通,昭示的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某种共同特性,不管网络文学还是传统文学,既为文学,则魂走一脉。

三、自由作为审美伦理与自由的道德

网络写作是一种自由的写作。这种自由首先来自网络的匿名性特点。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里面,没有权威,没有戒律,没有刻板的、整齐的一体化,没有文学传统塑造的创作学上的各种清规戒律。在虚拟的网络世界,现实世界的种种禁忌与理性藩篱,“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匿名写作状态下,人的羞愧、胆怯、自卑,甚至是耻感与罪感等,都无须成为作者的心理负担,作者可以尽情地剥掉生活中的伪饰,释放内心,挥洒才情与意志,这为网络的自由写作提供了心理上的可能。陈村说:“谁知道你是谁呢?你知道网上的对方又是谁呢?轻装上阵,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成为网络的最大诱惑,即便是千万双眼睛在同时注视着你的一言一行,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又不是观众在电视中看你的表演。”^⑪对匿名性给网络写作带来的自由可谓深有感触。

当然,匿名性仅是网络写手获得写作自由的心理基础,网络文学发表、传播过程中的“零审查”机制,则是网络写手获得写作自由的制度性保证。我们知道,传统的文学,往往是职业化作家的专利。一个人必须要经过大量专门的阅读和写作训练,乃至经过“圈子化”的文学规制的检验、残酷的竞争与淘洗,才有可能获得梦寐以求的作家身份。这种身份的存在,对很多有文学梦想的人来说构成难以逾越的天堑。然而,网络却解除了写作者们的身份顾虑,最大限度地释放出他们内心被压抑的文学冲动与审美激情。网络作家邢育森说:“说实在的,在没有上网之前,我生命中很多东西都被压抑在社会角色和日常生活之中。是网络,是在网络上的交流,让我感受了自己本身一些很纯粹的东西,解脱释放了出来,成为了我生命的主体。……是网络,是这个能自由创作和发表的天地,激励了我本已熄灭的热情,重新找到了旧日那个本来的自我。”^⑫这里,邢育森所说的被社会角色和日常生活所压抑的“生命中的很多东西”,恐怕不仅是作家的梦想本身,还有文学才能准确传达出来的生命与感受。而且,网络文学不像传统的

纸质出版媒介,有责任编辑、主编的层层把关。作品能不能发表,涉及编辑、主编的文学趣味,刊物的定位乃至作者的名气等。对传统文学而言,这些因素既构成一种检查、监督的隐性规范,同时也是一种接纳与排斥机制。对网络文学而言,这些审查机制几乎没有作用,“网络空间的无限存储性,以及网站聚集人气的需要,使得作品发表门槛很低,文学资质审查十分宽松,网络发表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⑬。

网络文学的匿名性和“零审查”机制,给网络写作者提供了多方面的自由,从作品的发表,到创作方式的选择,从写作者的个性表达,到道德选择的无所畏惧,网络都可以让写作者得到满足。网络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我们当然无法去洞悉它的全部底细,然就部分颇具声名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结论:尽管网络文学的确是以娱乐、消遣、排遣、游戏为主要叙事目的,但是,在许多网络小说当中,写作者们身处社会转型、生活裂变、价值重组时代,注定了他们会以切己的方式,传达出自我鲜活的感受与体验。对网络文学有比较深入研究的马季说:“网络写手大多是业余爱好者,写作时间不够充裕,写作技巧不够成熟,而且他们写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荣誉,往往是为了发泄,或者是通过扮演以实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社会角色,以求得在虚拟世界中的象征性满足。所以,他们的作品多的是人生感触,少的是语言锤炼。”^⑭这种分析是相当中肯的。比较传统文学与网络写作来看,虽然这些年我们有诸如“新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身体写作”、“底层写作”等充满经验主义魅惑的文学口号,但是,真正从创作上来讲,传统文学缺乏的恰恰是生活的基本经验。不少作家要么热衷于形而上人生哲学的叙述激情,要么沉迷于对类似于“底层”的“他者经验”的想象,显得与真切的生活有点“隔”。倒是在不少网络文学,比如像《成都,今夜请把我遗忘》、《和空姐同居的日子》、《爱在深圳》、《婚姻很远,暧昧很近》、《爱是寂寞撒的谎》等作品中,写作者更能把自己生活中的理想与希望、矛盾与困惑、痛苦与失落等原生态的感受表达出来,使得他们的作品真正具备了某种生活的质感,勘探出时代生活巨变与精神变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自由是文学的本质。作家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方可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实现创作者的个性。自由是与创造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自由,当然就很难谈得上有什么创造,没有实现创造的自由,同样是毫无意义的自由。甚至可以说,创造是自由的基本道德担当,没有创造的自由,是不道德的自由。自由对于文学创作而言意义深远,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是文化的产物。人类的一切道德经验,是非之心、美丑之辨,都源自历史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规训。自由的意义,就是在人的怀疑精神的引导下,对历史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规训作出深刻反思,并在人的自由意志驱动下,建立新的审美感觉和心灵的道德判断,从而在思想、道德与审美层面作出创新。就时下的网络文学而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创造性的。从文学类型上看,除都市、言情、武侠、历史、军事小说等是常见的以外,其他如玄幻、修真、灵异、架空、穿越、网游、竞技文学等,虽说与传统经典文学作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把《大话西游》等“无厘头”影视作品作为蓝本,因此很难说是网络文学的独创,但是,网络写作者的改造性劳动与融会之功,同样值得我们尊重。而在对时代精神与人们的道德状况的把握上,有些文学作品虽然从表面上看不过是娱乐、消遣、戏拟、调侃、消解、颠覆之作,但是,作品的人物、情节、构思等,却往往凸显出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内在悖论。如《悟空传》,通过对传统经典名著《西游记》和电影《大话西游》的故事、人物关系和主题的改写,在对神圣与英雄的颠覆中,传达出当代人的心灵困苦与道德悖论:“因为崇尚自由,‘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我们打破了一切神佛,而当我们的神龛不再供奉着神佛时,又难免会陷入孤独和虚空。《悟空传》弥漫的无疑就是这种“虚无”与“空”的精神哲学气息。《诛仙》

则借鉴了武侠小说复仇、斩妖除魔、匡扶正义的传统套路,一方面营构出情节起伏、冲突跌宕的好看故事,另一方面,却又颠覆了传统武侠小说的正义/邪恶的价值论模式。小说借黑石洞狐妖之口说:“所谓的世间,便是由你们人族当家作主的吧?天生万物,便是为了你们人族任意索取,只要有任何反抗,便是为祸世间、害人不浅,便是万恶不赦、罪该万死了,对吧?”作品由此跳出了传统武侠小说的社会正义论与历史正义论的叙述框架,而在一种宇宙正义论的叙述时空中,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理性神话,并对现代社会“成王败寇”的竞争理性法则提出了严正的质疑,宣示了众生平等的思想。这种叙述,可以说是深具思想与美学意义的。

类似的具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网络文学作品,当然还有不少。它们能够赢得读者和图书市场的青睐,并不单纯地靠千奇百怪的娱乐性叙事元素,而是因为与当代社会的时代精神与大众的人生情绪有着相当的契合,与当代人的心灵有着呼应与沟通,才能最终获得读者大众的认可。它们天马行空的叙述方式、奇谲诡怪的想象力、荒诞不经的故事取材,既得益于写作者个体的文学禀赋与才情,也得益于网络创作的自由环境。正是网络的自由、多元与包容,给网络写作的各种尝试提供了可能。但是,网络文学的自由并非总是好的东西,就像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说的那样,“摆脱束缚,获得自由”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即“自由地发展”之自由并不是一回事。网络写作者的自由,大多建立在挣脱社会规范束缚和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随心所欲的自然冲动基础上,并没有形成弗洛姆所说的“人日趋完善,对自然的支配越来越得心应手”的超强“理性能力”^①。写作者的思想能力、审美能力、叙事能力、驾驭题材与故事的能力、语言能力等,与纸质媒介的作家相比可能有很大差距。这种对“自然的支配”的“理性能力”的欠缺,使得许多网络写作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许多作品一旦在网络上声名鹊起,写作者似乎就失去叙述的控制能力,枝枝蔓蔓,拉拉杂杂,越写越长,像《明朝那些事儿》、《诛仙》、《鬼吹灯》等,都是如此。

当然,网络作品的长度还不能算是网络自由的副产品,真正滥用自由的,是那些把网络自由理解为可以无视道德、法律与理性,可以无所不为、胡作非为的写作现象。我们知道,网络写作本身就是一种青春期的亚文化写作现象,本身带有发泄、冲动、叛逆、颓废、迷惘的可能性,加之网络写作审查机制的缺席和某些文学网站推波助澜,近些年来,网络写作当中的淫秽、色情、暴力、凶杀、迷信等不健康书写大肆蔓延,“西陆网”、“浩书坊”、“言情小说网”等文学网站,都曾登载过一大批后来被查禁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写作自由”,不仅是对自由的误读,也是对自由的亵渎——无论如何,自由都不是为所欲为。自由既是人的天性,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责任,是对创新的担当。这种担当构成自由最严厉的本质。每个追求自由、享受自由的人,都应该有如此担当,必须承受自由的严厉本质。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李寻欢在2002年告别网络写作的《粉墨谢场》“自序”中的话十分耐人寻味:“李寻欢之‘死’,完全是自觉自愿和平方式深思熟虑之后的正常举动……作为一个五岁的网虫和网络从业人员,我对网络有客观的充分的认识,而作为一个出过三四本书但没什么东西有营养的文学青年,我自知离真正的文学殿堂还相差甚远。那么,最简单地,我放弃这个名字,是对过往网络生活的怀疑,以及对真正文学的敬畏之心。”^②这种对文学的“敬畏之心”,我们可以理解为李寻欢对自由严厉本质的承受——如果不能写出“有营养”的东西,宁愿“放弃”。这样的“放弃”,既是对文学的尊重,我认为也是对自由的尊重。而现在的许多网络写作者,最需要的恐怕就是对网络自由本质的理解和尊重。

①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挑战传统与更新观念》,载《湘潭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② 董学文:《科技进步与艺术发展矛盾关系断想》,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1期。

③ 关于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产量,并无权威统计数据。2011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刊发《精品力作 姹紫嫣红开

遍——我国文化产品创作充满活力空前繁荣》,记者撰文指出,“如今,我国的文学艺术创作正进入丰收的季节。仅2010年,小说类新书数量就有4300多部,首次发表和出版的长篇小说2000余部,长篇小说总量达到前所未有的3000余部,是世界上产量最高的国家”。2011年3月16日,《文艺报》刊发何镇邦《当代长篇小说的异类》,文中提到,“每年长篇小说产量接近3000部,由网络作品转化为纸型作品中的类型化作品占3000部产量的40%”。

- ④ 胡适:《中国文学的过去与来路》,《胡适文集》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 ⑤ 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胡适文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 ⑥⑬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109页,第115页。
- ⑦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6页。
- ⑧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 ⑨ 洪治纲:《网络文学的基本伦理与审美趣味》,载《黄河文学》2010年第1期。
- ⑩ 李寻欢:《对李寻欢的放弃》,见<http://www.people.com.cn/GB/wenju/66/134/20021023/849037.html>。
- ⑪ 陈村:《陈村眼中的网络文学》,转引自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概论》,第115页。
- ⑫ 吴过:《青春的欲望和苦闷——网路访邢育森》,见<http://www.jiyw.com/htmlcontent.asp>。
- ⑭ 马季:《读屏时代的写作——网络文学十年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 ⑮ 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7页。
- ⑯ 李寻欢:《粉墨谢场·自序》,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单位 浙江财经学院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张颖

·书 讯·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

托洛茨基 著 施用勤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出版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托洛茨基于1926—1938年间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信件、讲话。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中的文章都写于党内斗争时期(1926—1927),主要内容是对斯大林、布哈林错误的中国革命路线的批判,在这部分中还收录了联合反对派其他领袖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第二部分中的文章写于托洛茨基流放和流亡期间,其中除了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进一步理论总结和思考外,还有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应采取的斗争策略的论述。在第一部分中,托洛茨基依据不断革命论,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才能把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因而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在革命高潮中建立苏维埃,对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和后来的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分共都做出了准确的预判。他提出的这些措施能够扭转中国革命的进程,改变它的结果。在斯大林从极右转向武装起义的冒险时,他也及时提出批评,认为中共在遭受严重失败后,应该从事民主斗争,总结经验,积聚力量。虽然由于斯大林不接受托洛茨基的建议,这些本来可以挽狂澜于即倒的思想未能挽救中国革命,但它们仍不失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战术经典。